

《中国经济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经济史》

13位ISBN编号：9787802253827

10位ISBN编号：7802253829

出版时间：2008-01-01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侯家驹

页数：89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中国经济史》

内容概要

侯家驹先生花费11年时间撰写本书，全书讨论了中国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演进的轨迹，并将中国自秦汉起区分为三个一元体制与两个多元体制时期，对于各个体制的政经制度、社会环境、公共政策等，作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并评估其财经得失。除了根据具体史实从一般经济理论观点予以评论外，还提出了地盘成本（保障成本）及制度成本的概念，以作为衡量得失的标准，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极有价值。

《中国经济史》

作者简介

侯家驹，台湾中兴农经所毕业，澳洲新英格兰大学农经硕士，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国贸系与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私立东吴大学经济系名誉教授。毕生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著有《中国经济思想史》、《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先秦法家统制经济思想》、《国际贸易的挑战》、《周礼研究》、《经济统一论》、《中国财金制度史论》等。

书籍目录

序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 第一节 经济史与史学 第二节 经济史与经济学 第三节 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 第二章 经济史演进的轨迹 第一节 经济史的主体及其追求目标 第二节 经济史中的制度因子及制度成本 第三节 经济发展趋势与阶段论 第四节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及大小国之分 第五节 小结 第三章 中国经济史阶段划分暨写作大纲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史上阶段的划分 第二节 本书撰写方式 第二编 古代社会 第四章 原始社会 第一节 传说时期 第二节 唐虞时期 第三节 夏商二代 第五章 西周（前1027-前771年）——封建制度之建立与衰落 第一节 出现近代国家雏形 第二节 封建制度的划时代意义 第三节 封建制度下财经之优点 第四节 封建制度下财经之缺失 第五节 小结 第六章 东周（前770-前222年）——由封建社会到重商主义 第一节 绪言 第二节 封建制度的崩颓 第三节 战国的重商主义 第四节 东周财经的优异面 第五节 东周财经的缺失面 第六节 小结 第三编 第一次一元体制：秦汉——郡县制度 第三编附录 公元前中国经济发展之阶段——由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 第七章 由封建制度到一元体制：演变与特色 第一节 政治趋于专制 第二节 经济趋于统制 第三节 社会趋于管制 第四节 大一统在经济上的缺失 第五节 大一统在经济上的贡献 第六节 大一统与中国治乱循环 第八章 大一统下的社会环境与政府角色 第一节 从户口变迁看南方之逐渐开发 第二节 阶级变迁与土地兼并 第三节 人民生活情况 第四节 财经职官概述 第五节 赋役制度及政策 第六节 货币金融制度 第七节 社会福利政策 第九章 大一统下的经济暨产业发展 第一节 公共建设 第二节 科技进步及企业家的出现 第三节 农业发展与重农措施 第四节 工业发展与公营事业 第五节 商业发展与经济中心之分布 第六节 对外贸易的发展 第七节 秦汉财经得失 第八节 大一统的崩溃 第四编 第一次多元体制：后汉末至南北朝——坞堡经济 第十章 多元体制下政经特色 第一节 政治趋于乖离 第二节 经济趋于隔离 第三节 社会趋于疏离 第四节 战火蹂躏下的破碎经济 第五节 隔离与疏离的经济效果 第六节 多元体制对经济的贡献 第十一章 多元体制下的社会环境与政府角色 第一节 南方崭露头角 第二节 阶级变迁与宗教勃兴 第三节 人民生活情况 第四节 政风与财经官制 第五节 赋役制度及福利政策 第六节 货币金融制度 第十二章 多元体制下的经济暨产业发展 第一节 人地关系的新整合 第二节 科技发展与公共建设 第三节 农工业发展与公营事业 第四节 商业发展暨经济中心 第五节 国际贸易的曲折发展 第六节 多元体制下的财经得失 第七节 小结——由分裂趋向统一 第五编 第二次一元体制：隋至盛唐——府兵制度 第十三章 第二次一元体制下政经特色 第一节 政治趋于开明专制 第二节 经济趋于放宽统制 第三节 社会趋于松弛管制 第四节 略论隋唐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第五节 长安：世界性首都 第十四章 第二次一元体制下的社会环境与政府角色 第一节 南方成为经济重心 第二节 人民生活与由俭入奢 第三节 财经官制 第四节 府兵制度下的田制与税制 第五节 货币金融制度 第十五章 第二次一元体制下的经济暨产业发展 第一节 公共建设 第二节 农矿业之发展 第三节 科技暨工业发展 第四节 商业发展与经济中心 第五节 隋唐对外贸易 第六节 隋唐财经得失 第七节 小结：天下又由合而分 第六编 第二次多元体制：中唐五代两宋——区域经济 第十六章 第二次多元体制下政经特色 第一节 政治离而少乖 第二节 经济离而不隔 第三节 社会离而鲜疏 第四节 乱世经济残破及救济措施 第五节 财经制度的变革 第六节 此一期间经济之病象 第十七章 第二次多元体制下的社会环境与政府角色 第一节 宗教发展与社会伦理 第二节 东南愈重与西北愈轻 第三节 人民生活 第四节 财经官制 第五节 赋役制度之演变 第六节 公田、专卖及杂税 第七节 货币金融制度 第八节 社会福利与社会互助 第十八章 第二次多元体制下的产业暨经济发展 第一节 公共建设：治水与养士 第二节 农矿业之发展 第三节 科技暨工业发展 第四节 商业暨都市发展 第五节 对外贸易之拓展 第六节 中唐至两宋财经得失 第七节 小结：天下再由分而合 第七编 第三次一元体制：元明清——中央集权 第十九章 第三次一元体制下政经特色 第一节 政治益趋专制 第二节 经济益趋统制 第三节 社会益趋管制 第四节 中学西传与欧风东渐 第五节 元代经济扩大掠夺与明清对经济的干预 第六节 资本主义在明代萌芽 第二十章 第三次一元体制下的社会环境与政府角色 第一节 民智渐开与逐利渐炽 第二节 南方担当财经重任 第三节 人民生活 第四节 财经官制 第五节 税制之演变 第六节 公田、专卖及杂税 第七节 财政之疲敝 第八节 货币制度 第九节 信用制度 第十节 社会救助与福利 第二十一章 第三次一元体制下的经济暨产业发展 第一节 公共建设：交通与学校 第二节 农矿业之发展 第三节 科技暨工业发展 第四节 工匠与行会 第五节 商业暨都市发展 第六节 对外贸易之起伏与移民 第七节 元明清财经得失 第八节 小结：天朝沦为弱国 附录 强迫学习的历程——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肇始 第八编 结论 第二十二章 结构间结论 第一节 经济发展条件 第二节 政治分

《中国经济史》

合与经济发展第三节 政治循环的经济因子第四节 战争与经济第五节 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第六节
政府与经济发展第七节 文化与经济发展第八节 家族与经济发展第二十三章 结构内结论第一节
崇本观念与农业发展第二节 抑末观念下的工业停滞第三节 商业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第四节 对外
贸易与经济发展第五节 科技与经济发展第六节 人口与经济发展第七节 土地与经济发展第八节
资本与经济发展第九节 产权、人权与经济发展第二十四章 回顾与展望第一节 回顾第二节 展望
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 经济史是一种混合学科，既属于历史，又属于经济学，所以，在说明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以前，要分别说明经济史与史学以及其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是相当后起的学科，若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算起，到现在只不过两百多年，而真正的经济史著作，则出现得更晚，就西方言，主要是出版于19世纪——中国正史中虽有《食货志》等类记述，实则只是历史的附庸，而且多为财税材料之堆积，谈不上有系统的著作（《史记》中《平准书》与《货殖列传》除外）。西方的经济史既然后于经济学之发展，照说，其内容应受经济理论之指引，但揆其实际，并非完全如此，这将探讨于第二节。在另一方面，历史学在发展上虽然早于经济史甚至经济学很多，但在发展上——尤其是近代的发展上，却深受经济史及经济学的影响，这将在第一节析述。

关于经济史的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接受经济理论的指引，反映出以往经济发展过程实况，帮助读者明了目前经济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归纳经济发展史实，以丰富甚或批判经济理论的内容。至于经济史的范围、定义，以及撰写经济史的指导原则，主要是从历史学，尤其是从新史学领域中所撷取。

第一节 经济史与史学 经济史的直觉性了解，厥为经济方面史实的陈述，是以，从史实的陈述观点看，经济史应该是属于一般性历史中的一支，因为“简单的说，历史（亦）只是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纪录而已”[1]。可是，无论中外，史学家所写的历史，实质上都是政治史，中国廿五史的本纪，固皆为政治，列传中除《儒林》、《文苑》等类外，亦均属政治范围，西方亦是如此，所以，英国史学家Freeman干脆地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2]这些都统称为旧史学，鲁宾孙（J.H.Robinson，大陆译为罗宾逊）曾将这些史学家的通病，归纳为三点[3]： 1.随便包括人名地名，并没有什么意思，不能激起读者的思想同兴味，适足以压下他的精神； 2.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重事实的记载； 3.喜述最不普通的故事，不是因为它们可以说明人类状况的进化。 或者某时代的一般情形，只是因为它们在编年史上很特别。 所以，鲁氏提倡“新史学”，要摆脱这些通病，并要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鲁氏《新史学》一书是出版于1912年，十几年后，巴恩斯（H.E.Barnes）出版《新史学与社会学》，认为“据新史家之意见，史学之目的，在以过去时代之庐山真面目介绍于现代，使之理解现代文化成立之经过与原因。夫如是，然后始能知悉吾人文化中之重要实质与进步，以及原始时代遗下阻碍进步之残余”；并认定“新兴史学中之新元素，为对于人类发展中经济、社会、科学诸因素之更加重视”，盖因“承认文化之基本为经济”；进而指出：“现代史家，坚守成规，执迷不悟，对于经济史部分完全置之不理，然而经济史最重要之著作，已于上世纪最后25年内完成。传统史家只知注意贵族论题，如路易十四之服饰，考尼茨之狡诈，路易十五之不德……而对于Colbert之经济政策，Turgot之财政改革，或大陆体系之经济形态，反而藐视之，不屑加以考究。其结果，大学中之经济系，遂不能不欢迎历史中被排斥之最重要部分而加以培养”[1]。后者显然是指1890年代，英、美大学于经济系，开始讲授“经济史”，但法、德等欧陆大学迄今仍不太愿开授此一学科。 巴氏所说的“历史中被排斥之最重要部分”，当然是指经济史，而对其持“排斥”态度者，当然是指旧史学，至于新史学则视之为“最重要部分”。其实，新史学之发生，实在是溯自经济学家对历史的诠释，鲁宾孙就曾说：“无论如何，19世纪以前历史学家所不注意的那些永久的而且普通的原动力，现在能够特别注重起来。开这条研究新路的人，不能不首推经济学者。”[2]其所说的“经济学者”，即指马克思。易言之，由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问世，引发史学界的“革命”，出现注意与运用社会科学于历史写作的新史学。 但因经济史亦在陈述史实经济面，所以，在撰写上，当然亦要受到一般史学的规范。在这方面，中国史学颇有值得借镜之处，盖因中华民族最重视历史，自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起，就有正确而不断的史事记载。

所谓史学，乃是有关撰写历史之理论，其所涉及的，至少为“人”与“事”。所谓“人”，是指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条件；所谓“事”，是指史事如何选择。关于历史学家应具之条件，刘知幾认为是史才、史学与史识，此即刘氏所云：“史有三长，才、学、识。”（《新唐书》本传）[3]其后，章学诚增加“史德”一项[4]。梁启超曾将这四个条件，按其重要性依次排列为史德、史学、史识与史才，并予解释：史德是指力求忠于史实、不夸张、不歪曲、不附会、不武断；史学讲求搜集资料，判断真伪，抉择取舍的方法；史识是指敏锐的观察力，但须避免为因袭传统思想或自我成见所蔽；史才是指撰写历史的技巧，涉及材料的组织与文字的风采[1]。但从世界观出发，可能还要加上鲁宾孙所说的“史心”[2]。鲁氏对此并无明确说明，此处所谓的“史心”指史学家要把握历史精神，是动态的、进化的，而且是综合的，须利用各种社会科学成果以说明历史的进程。关于史事的选择，张荫麟于其《

中国上古史纲·自序》中所提及的五个标准，可说是言简意赅：第一是“新异性标准”，即指时空位置的特殊性——但与鲁氏所指斥的“最不普通的故事”不同；第二是“实效标准”，凡史事所直接牵涉或间接影响人群的苦乐愈大者，则愈为重要；第三是“文化价值标准”，所谓文化价值即是真与美的价值，依此标准，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为重要；第四是“训诲功用标准”，所谓训诲功用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一是成败得失的鉴戒，是以，训诲功用愈大的史事愈为重要；第五是“现状渊源标准”，凡史事与现代状况关系愈深，或愈有助于现状的解释者，则愈为重要。史事经常是赅续的、繁杂的，上述五个标准，只能协助个别史实的选择，而难以系统化，所以，张氏于《自序》中，又指出用来统贯“动态历史的繁杂”，主要有两大法则，一为因果范畴，一为发展范畴——从这一点看，张氏所云，又有些像是“史心”。关于史学中“人”与“事”各种条件，在经济史上的运用，将于第三节中释论。

第二节 经济史与经济学

中国虽是重视历史的国家，但并没有出现真正的经济史，《史记》中虽有《平准书》、《货殖列传》及《河渠书》，且自《汉书》起，史书多列有《食货志》与《沟洫志》等有关专志，惟多为史料之堆砌，缺乏统贯性，而且很多正史并无这些专志，例如《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五代史》、《新五代史》十二史缺《食货志》；缺《沟洫志》或《河渠志》者更多，除此十二史外，《晋书》、《魏书》、《隋书》、《唐书》、《新唐书》、《辽史》、《金史》七史亦未包括。至于通史性的经济史更付阙如——《古今图书集成》中的《食货》，更只是史料而已。在西方，早期情况更劣，古代的西方历史学家，根本不重视经济史，因为他们都是僧侣，只注意僧侣们的事情，他们对于生活的认识，实与经济史背道而驰，直到城市经济开始发达的时代，人们才开始写下关于经济事物的思想，John Wheeler于1601年出版的《商业故事》（A Treatise—D of Commerce），可能是这方面的第一本专书，该书虽然也包含了很多历史的记述，但仍然是一本实用的书，而不是历史书。谈到西方经济史，不由人不提起苏格兰的两位亚当（Adam），第一位是亚当·安德逊（Adam Anderson），他于生前写了两本厚书，死后，被扩充为四本书，初印于1764年，题名《商业起源的历史与年代之推论》（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由洪水时期写到他的时代，即由诺亚方舟写到东印度公司商船队带回香料及棉布。其书名虽称为商业史，但其内容正与经济史相同，因为安德逊于此书中注意贸易、制造、殖民地、人口、贸易差额、货币及生活程度之提高。不久，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1776年出版其不朽名著：《国富论》，这虽然是本经济学著作，但其中攸关于历史的章节，在英文中，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研究经济发展的最光耀论文。至于西方经济史的著作，一直到1880年代才进入成熟时期[1]，例如W.Cunningham于1882年出版的《英国工商成长史》（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成为第一本有系统的英国经济史（见《大英百科全书》）。章学诚曾说，“六经皆史也”[2]，西方若干经济史学家亦持类似看法，而认为若干经济学著作是经济史，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剑桥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克拉彭（J.H.Clapham），不仅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把历史和经济分析混合到恰到好处，他也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第五版起就变成一部人口史与积极节制人口的工作史；马克思主义比任何其他学说都鼓励人们从事经济史的思维和研究的工作，他甚至说“我觉得马歇尔（A.Marshall）是个伟大的经济史学家”

在另一方面，若干经济学家亦非常重视历史之研究。其中最著名的乃是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的健将们，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累积性发展与成长，其论点是比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认为社会是一有机体，会诞生、发展与成长，最后则将凋萎与死亡，所以，社会永远是在变化的，职此之故，对于某一特定时间的某一国家适合之经济学说，也许对于另一国家或另一时代不见得适合。在经济理论研究上，他们非常重视对经济作历史性探究，其理由是因为经济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是相互依赖的，所以，无法不连同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而单独研究政治经济学，因此，历史学派批评古典学派与边际分析方法上是抽象的、演绎的、静态的、不切实际的，缺乏史实的质量，而历史方法则可探究经济现象的“一切”力量，经济行为的“一切”面，并非仅是经济逻辑[2]。

德国历史学派的首脑人物为利斯特（F.List），其名著《国民经济学体系》[3]，计分四编，而以《历史篇》为第一编，分述意大利人、汉撒人、荷兰人、英格兰人、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法兰西人、日耳曼人、俄罗斯人、北亚美利加人之经济史，此外，并在第二编《理论篇》与第四编《政治篇》中夹叙历史。其后，有若干历史学派的健将，甚至企图以历史叙述代替经济理论，如其最后大师西摩勒（Gustav Schmoller），于1900年至1902年出版两册《原理》，就想实现这一企图，强调“历史的叙述可变成经济理论”，但在事实上并未成功[4]。而他于1886年出版的《重商制度与其历史意义》（The Mercantilism Syste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虽是一小册，却成为名著。后来，美国制度学

派强调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使命，认为经济制度的进化与功能，应是经济学的中心主题，遇到经济课题，制度学派人士不是问“是什么”？而是问“我们如何到达此处？我们要到哪里去？”——显然可见，这是属于经济史范围。所以，制度学派研究方法所要求的知识，不仅是经济学，而且是历史、文化名著、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1]，这一观点是和上述新史学方法论契合。以上是说，有些经济史学家认为若干经济理论的著作是经济史，另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史可以变成经济理论，正显示经济史学家与经济学家彼此惺惺相惜。这种惺惺相惜，并非所有有关人士均能接受，因为就有若干经济学家与经济史学家格格不入，例如在古典学派中，除史密斯等经济学家外，多数学者不太注意经济史，他们想将经济学放在演绎方法上，认为历史只能有很少的贡献，逻辑学才是他们主要的或惟一的武器[2]，越到现代，数理模式成为经济分析的主要工具，经济史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更形低落。尤有进者，若干经济史学家并不重视经济理论对经济史的协助，甚至有些经济史学家认为经济理论不但不重要，而且会妨害经济史的撰述，他们证明，驾驭问题用不着经济理论[3]。其实，“格格不入”这一派，是一种昧于事实的极端，因为古典学派走向演绎法，是始于李嘉图（D.Ricardo），当时就有人攻击其理论缺乏历史内涵与理论。但当代经济学家阿罗却认为其学说已经明言，分配理论是有其历史限制性[4]；另一经济学家苏罗亦说，他在讲授工资争议理论之前，一定要求其学生研读考特的《1870-1914年英国经济史：诠释与文献》（Courts 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1870—1914: Commentary and Documents）中，“工资争议”与“最小观念”二章[5]。以致巴恩斯将历史现象之解释分为八派时，认为其中之一是经济学派，并将李嘉图列入其中[6]。20世纪中叶后，主要为1960—1970年间，在美国发生所谓“经济史学革命”高潮，认为经济理论简直就是经济史的一切[1]，进而成为另一极端。这是由于诺斯（D.L.North）与福格尔（R.W.Fogel）二人，分别使用新古典经济理论与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19世纪美国经济史，从而蔚为风气。但是，计量方法必须使用完整的数据，以致只能局限于近、现代经济史之研究；而且，新古典经济学只适用于市场经济之运作，而赫克斯（J.R.Hicks）于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1969）一书中，曾经指出，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是由习俗经济而指令经济，再过渡到市场经济，而真正的市场经济，亦不过始于18世纪。不过，这并不意味经济学与经济史彼此不相干。关于经济史与经济学之问到底有什么关系？耶鲁大学经济史教授柏克（W.N.Parker）与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金德博格（C.P.Kindleberger）策划，邀请著名经济学家与经济史学家共同讨论之。在此讨论中，经济学家阿罗认为经济理论中的理念与方法，业已证明在经济史中非常有用，因为经济理论可为经济史提出新疑问；但在另一方面，经济史可对经济理论提供数据[2]。另一经济学家苏罗一面说，“如果一个模式的合适选择，是取决于制度性内涵——而且应该如此，则经济史可以表现美好的功能，即扩大理论家观察的范围”；另一方面则说，“经济理论家是形成模式与检验之，看看经济世界现在是否如此，或者是否和我们所想的一样。经济史学家则可询问，此模式应用于较早时代或其他地方，是否亦是确然？若为否定，则要询问为何如此”[3]。

《中国经济史》

编辑推荐

说到本书有七八十万字，可能有人问到，写本国经济史何必花这么大篇幅？答案是本书系采用“大历史”写法，即除经济事务外，尚论述政治、社会的背景。所以本书不仅是经济学人的读物，亦可作为通史与断代史学者的参考。——侯家驹

精彩短评

- 1、一般。有启发。
- 2、至少看着很漂亮很澎湃的一部经济史，900页论述两个貌似不大靠谱的模型（我觉得如果两个模型不拿经济学图系表述的话，会好很多吧，至少槽点少），老人家要是一次写好说不准还能领一时风骚（虽说也是文化界的）。。。
- 书的内容还是不错的，不过经济历史学两边不讨好，也是一种无奈吧。。。再说一遍，当做小说很好看，至少这个流畅度，简直是经济史里少有的。。。
- 3、目前为止最为有力的综述性质的中国经济史专著
- 4、以时间为轴，分三个一元时期和两个多元时期分述中国经济发展，间杂政治面的一般性批评，对历代经济政治得失深入评鉴，很不错。
- 5、侯老的著作，非同凡响，继续啃读中~~~
- 6、翻阅。
- 7、非常非常失望！
- 8、以论带史
- 9、黄仁宇《16世纪明代财政与税收》互相考证
- 10、史料太多，最后也没有看完.....
- 11、糟糕
- 12、史料详尽。可是作者经济学水平不够，并且西方观点很强，导致分析不足，头绪混乱。
- 13、2011-03-15;读这本书，我提不起兴趣，可能是不合我的口味。
- 14、还可以吧。。。
- 15、出版社的编辑应该拉出去枪毙十分钟，令人发指的错别字比比皆是。作者罗列了大量的史料，但是却有多少考证分析，感觉太分散了，而且同样的一段史料在不同的地方罗列了几次，我看书名后面加个“稿”字才名符其实。
- 16、大历史类型，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持和原点索引。如果是戏说网文之类的确不错。但是作为正经经济历史读物则不足取
- 17、虽然是学金融的 但看古代的经济史还是头大
- 18、经济学从某种程度上讲有点像化学。首先有了历史事实（在化学是实验结果或现象），然后有了对历史的总结形成理论，理论是具有预测性的（理论化学计算很多工作就是利用理论去解释或预测实验中的种种）。
- 19、作者缺乏基本的考据精神，很多地方的引用都是为着附会自己的理论。这种附会从前言一直持续到下篇。有的地方甚至自相反对。
- 最初看到此书，还觉得观点挺新颖的，买来一读却大失所望。作者水平实在有限。
- 20、中国经济史之通论无有过之者。
- 21、对只是对经济有兴趣的业余读者应该离它远点 看起来好累啊
- 22、看完都忘了写书评，可见对此书多么无感。罗列古文资料只能说作者花了时间，但是没花精力把资料总结整理。许多章节就是引用一段古文然后进行解释翻译，看不到自己的思路。而且很神奇的是，最后就总结出来集权政府就是渣。最近看的一本百年史都能讲出比这有趣多的故事。
- 23、遗憾在于结论部分，侯家驹始终没能更进一步将其推进到宪政领域。
- 24、相对于钱穆，侯家驹更注重用现代经济学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经济制度演变，不可多得的好书。
- 25、严谨的态度，翔实的人史料，珍贵的参考。
- 26、比较失望,作者观点不和口味.
- 27、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中国上下五千年，去了解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摒弃意识形态。不过没有近代部分。
- 28、一部很用心的书，不过如果想快速的阅读完的话，只看这部书的开头和结尾即可。
- 29、不光是经济史，更是对中国历史演变的深入解读
- 30、用10年写出的书肯定值得一读。到40岁能写出这样一本著作，就很满意了。

精彩书评

- 1、侯家驹先生的这本书很好，既有中国传统的治史严谨，又有现代经济学观点支撑，两者结合的很好，顺序排的也很好，书中屡有新鲜的观点
- 2、这本书用了不少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史，但我仅就我看到两汉魏晋这些部分来说，史料的依据感觉依然分量不是很足。比如说有一部分说两汉的工商平均利润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大意），他的依据只是汉书（还是后汉书，要去看原书）食货志里人的一句话而已，仅仅依靠别人的一句话，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依照当时的统计条件，也是无法统计出平均利润率的。而且这本书有一种强烈的反中央集权的感情倾向，虽然我也不赞同几千年的皇朝集权的传统，但是历史书就该是分析历史的因果得失，而不该有太多太明显的主观倾向。而且这本书是从每个时期，分出一个个专题来叙述当时的事情，时间的质感不强。总之，感觉这本书不太严谨，但理论上比较新颖。
- 3、我刚买这部书，觉得作者用意很明显，要以史记为榜样，开创中国经济史学先河！作者做到了这点！而且作者把经济理论与历史事实相结合，功底不是一般的人。至于有的读者评价作者欠缺历史功底，不敢苟同。
- 4、中国经济史著者，大多为“历史的经济”，而非“经济的历史”。这在马克思主义一元统治的大陆思想界，尤其是如此。经济学擅长提取一般规律，历史学固然也有此愿望，但头绪繁多，人性论，阶级论，地域论，不一而足，很难达到化简的结果。台湾已故学者侯家驹先生所著《中国经济史》，是罕有的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中国历史（不仅仅是经济部分）的著作。全书上迄三皇五帝，下至清末。既有细节展示，又能一般归纳。从学术上讲，是认真而有诚意的作品。说理清晰，对于略微生僻一点的概念都有普及化的解释。文字则是台湾学者固有的娓娓道来的传统气质。作者“最费心思”十一年着成此书，自信“不仅是经济学人的读物，亦可作为通史与断代史学者的参考”。有所成果，才能有所恃。对于中国经济史的争议，历来说法芜杂。立场不同，就会有大相径庭的阐释甚至结论。而且任何试图阐释全局的作者，都难免挂一漏万。本书作者作为典型的市场经济者，但亦承认政府失灵存在。如同绝大多数经济学者支持相对小的区域更有经济活力，但并不反对大一统，身在台岛，仍歌颂大一统的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一般均衡经济，更没有太多政治情绪，这是一位独立学者的良知。某些地方，难脱书生气的主观臆断，一厢情愿，但较之业内受盛赞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FairPlay”甚至“国家机会主义”的批评，不知强去多少。整体而言，虽有“以论写史”的倾向，但全书能够自我圆善，形成系统，所持观点一以贯之，亦体现了作者的学术功力。在选材的特点上，本书显得巨细无遗，以致于连续数页累积史料。个别材料的使用，也证明经济学家治史的疏漏。个别观点硬作解释，难免底气不足。但单就书后所附参考文献之多为笔者罕见来看，既能博览而后整合，就是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书中颇多新鲜见解，诸如仿西方的历史分期；对经济史学科的自我认同；以作者提出的“制度成本”定义衡量历代经济得失，并用现代经济视角与术语阐述；人地比例与统一分裂的关系；通过区分工业资本主义与商业资本主义解决了中国古代何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判断；通过库兹涅茨（书中为顾志耐）世俗主义、平等主义、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原则考查中国经济市场的发展程度，并得出了汉代文景时期、南宋、明代中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的结论；认定司马迁时代出现了零利润的均衡市场；以及对汉武帝、唐太宗这样雄主经济领域的过分干预甚至谬错的严厉指斥；对于元清野蛮民族的批评，则少见于大陆史学界；多赞扬理学使人自立，认识本我，进而维我权利，促进平等主义的贡献；作者还特别着眼于历代人民生活水平，有专章分析物价工资。讨论财经得失，也多从民生考量；作为台湾学者，自然亦有受台湾（民国）学界观点的影响。书中对政治统一与经济矛盾的矛盾不惜篇幅，这种矛盾也必然存在。掩卷而思，我们今日所见，均是后人揣测前人。前人无辙可依，摸石过河。后人有所警戒，可以根据情势调整之，宽松程度可大增。这便是从不同角度读史的好处。抛开前期泛读不谈，笔者所作“读书笔记”，誊抄精要，历时一周。择其数点，略谈感想，遂是此文。了结之日，台风“梅花”迫境，暑濡炎炎，汗发如浆。“读书笔记”所依据者，新星出版社2010年9月上下册版，版中偶有错字，似为憾事。2011年夏。
- 5、有点好奇台湾和海外的汉学界如何评价这本书，照我看来，这本书流存后世的主要价值应该在于告诉后来的治史者，如何避免写一本最糟糕的经济史。好的经济史应该是怎样的，以一个历史门外汉的见识来看，我确实不清楚，但这本书以雄辩的说服力至少让人了解了它的反面应该是怎样的。1、不需要提出足够水准的问题，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有问题。一切经济史要提出和解答的最重要的问题，应该都是和国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和成因有关。自先秦以降，普通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准是停滞、上升

，还是下降？为什么？以何种标准衡量？是人均占有粮食量？预期寿命？还是其他？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没有任何悬念，读完侯的书，你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没有变得更清楚。侯当然在试图提出和解答一些问题，但要命的是，问题大而无当，例如，第二次一元体制（指唐宋时期）的毛病何在？答案：皇权过于专制；官员和士兵过多，消耗国民收入；外交和军事费用过高；皇帝将大部分收入纳入私库，blah,blah。等等，侯老，是我的错觉，还是您老写的就是中学教材？观点陈腐缺乏深度也罢了，您老怎么也要拿点扎实的资料来印证这些观点吧？sorry,这个真没有。2、资料不管是否可靠，多就行了，辨析、归纳和推导当然是不需要的，罗列就行了。侯老哥堆积资料的方式相当惊人，这个总让我想起成都的农家乐，老板上菜的时候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荤的素的，凉菜水果，炖汤糕点，堆上来再说。说到资料是否可靠，举个例子，书中提到，李自成进北京后，搜罗到崇祯的私库至少3亿两白银，还有一种说法是18亿两白银，侯以此说明皇帝将太多收入纳入私库。这种天雷书中到处都是，相当有娱乐效果。3、分析工具似乎还停留在司马迁、司马光的时代。治经济史的学者如果不想停留在食货志的水平，分析框架和工具的构建应有一定水准。貌似这位侯老哥也提到了很多洋人和洋文，但很明显他的知识体系和治学方法没法与这些东东兼容，一涉及稍现代一点的理论的应用，这浅薄生硬处，真是惨不忍睹。再说就过于刻薄了。在当当买这本书前我倒没指望这是一本《西方的兴起》级数的经济史，不过，我以为凭这位老先生头上的荣衔，怎么也不会比同是台湾学者的赵冈差太多吧，有个赵冈六七成的功力，这本经济史也不会差到哪去吧？我错了。

6、台湾学者侯家驹先生花费11年时间撰写的《中国经济史》（上、下两卷）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它以88余万字的篇幅构建了一个完整而又颇具有机结构的体系。据作者所说：“本书系采用‘大历史’的写法，即除经济事务外，尚论述政治、社会的背景。所以本书不仅是经济学人的读物，亦可作为通史与断代史学者的参考。”本书不仅“博大”，而且“精深”。它从丰富而又庞杂的史料中勾画出两千余年中国经济史演进的轨迹，并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作为台湾学者，侯先生自有其独特的眼光。他以西方经济史作为参照系，通过中西比较，发掘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那就是政治经济，亦即权力经济。作者认为，中西方历史经验与发展道路有所不同。西欧诸国面积普遍不大，人口不多。这些小国对外面临国与国的竞争，内部则常有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抗衡，工商人士较易发挥其影响力，所以经济制度的变动势必导致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则不然，因幅员广袤与人口众多，执政者有君临天下之势，工商人士莫能与之抗衡，以致政治制度成为下层构筑（即基础），经济制度反而成为上层构筑。结果造成“政治制度左右经济制度，政治力量凌驾于经济活力之上”，这种格局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本书着力分析政治权力对中国古代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影响，因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从中即可看出中西方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书中说：“凡政府干预愈深者，则市场机能运作能力愈弱，反之亦愈强。”在政治权力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先秦时期，政府并不干预人民的经济活动，基本上奉行自由经济精神。但自商鞅实施农战政策起，秦国政府却干预人民的生涯规划，断绝了很多谋生方式，用强权迫使人民只能采取“平时为农夫，战时作士卒”的农战为业，最终目的是要人民完全为国家利益，实则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卖命。汉初实行的“无为而治”政策，显示自由放任精神的复活，出现很多白手成家的巨富，从而形成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幸的是，汉武帝为对匈奴用兵，将盐铁酒收归国有。不仅干预经济活动，而且与民争利，使本来正在艰难成型的自由经济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且因国营之故，官吏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百姓深受其苦。汉武帝的国营项目中，还未包括信用部分，而王莽对经济的干预，远甚于汉武。尤其国营信用机构，可能就是诱发后代政府和贵族放高利贷行为的温床，正如唐代的捉钱令史和元初的斡脱官钱。汉代发明的国家专卖制度为后代所继承，自唐代中叶以后，盐铁与度支、户部并称“三司”，重要的产业都为国营，致使工业难以正常发展。总之，市场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只能曲折发展，时断时续，最多只能在中央政府控制力量较为薄弱时，市场力量才能稍微脱颖而出。本书认为，早在秦汉大一统的初期，中国已有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现象。其后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发展出资本主义，关键就在于国家的统治经济与管制社会对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工商业发展打击最大。国营事业和统治经济建立后，对于工商业者已形成致命的打击。再加以在管制社会中，科技被视为奇技淫巧，阻碍聪明才智之士从事科技研究工作，从而使技术停滞，经济社会凝为静态。不仅市场经济如此，整个经济的发展都遵循着这一规律：“从中国经济史看来，左右经济发展情况的主要因子，是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的有无与多寡。”“历代经济情况的好坏，主要是依赖充分条件的‘充分’与否，即政府干预的多寡：凡干预较少者，则发展情况较优，否则较劣。”其实书中所述的“政府干预

”一词，虽然借用的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术语，但其中阐述的却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内涵。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实行的是一种公共职能，以政策性干预来维护社会公正和经济正常运转；相反中国古代政府的“干预”更具有强权掠夺的性质，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控制国家经济，从中获取巨额财富，以满足统治集团的无限需要。本书将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精辟地概括为“家天下制”，“家天下”的专制皇帝视天下的一切为一己之私，出于自身的贪欲而无限制地奴役人民、掠夺财富。历代皇帝多是穷奢极欲，即使皇帝本人不太腐化，但因家天下制度，君主要对祖先尽孝，就得大修家庙、建筑陵寝；同时还要荫及子孙，用公款供养大量的宗室贵族。“宫中除具有其自己资源收入外，其用度仍常列为政府预算，以清季言，宫廷支出约占总岁出十分之一。宫廷拥有巨额资源与大量挥霍，当然会将原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挤出，从而限制了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时机，皇朝对社会的剥削和掠夺大大超出人民的承受能力，便会造成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人民被迫起义造反，皇朝也随之灭亡。此前，已有少数内地学者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现象。早在上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王亚南先生提出“官僚制社会”理论，认为皇帝官僚统治中国社会，并决定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矛盾不是所谓的“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官民对立”；官僚获取财富的方式主要是政治手段，所以王亚南大力抨击官僚的贪污和腐败，指出中国官僚制的特殊性在于“整个政治权力，结局也即是整个经济权力。”（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122页）著名中国经济史学者王毓铨先生亦曾指出：“在中国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权力，不是经济权力。”“这种政治权力经济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典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议》，《王毓铨史论集》下册，第704、707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不过，若论全面阐述中国权力经济发展脉络、深刻揭示其中实质者，恐非侯家驹先生的这部力作莫属。因而，这是一部很值得内地学人认真阅读的佳作。黄敏兰/文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3日

7、这本书读了比较长时间，应该说侯老师写这本书是费了不少心力的。涉及方面比较多，史料枚举非常翔实。虽然是中国经济史，但其基本出发点是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即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还看待中国历史中经济发展中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在大国中，政治制度凌驾于经济制度之上，而小国因为政治制度有竞争关系出现经济制度优胜于政治制度时期，会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良机。汉、宋、明三次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最终均被政治权利一统化而扼杀，最终使中国这一东亚重要经济社会体远远落后于西方。本书在微观层面上提出了人地比较的概念，其实就是以生产发展的要素，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相匹配的原则来解释历朝兴衰，也是值得一读。

章节试读

1、《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1页

仅从目录上来看，已经有了一些意思。总的来看，统一后的两次多元体制让远离战争中心的东南发展加速，而三次一元体制却有着不同的效果。汉明清时期政治专制，经济统治，社会管制。这是由于统一后中央集权的力量过大，各地没有力量进行抗衡。而在唐宋时期经济社会史放松管制的。这两个朝代，也被大家认为是中国最兴盛的时期。

这一点，就给了我不少期待。

2、《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227页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好下者与之争（利）--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汉朝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资本主义的产生，有一系列富豪起于铁，盐，矿以及买卖。

企业家的兴起，白圭是战国之初的企业家，史载，他“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并且岁熟取谷，予以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战国时期其它企业家如猗顿与郭纵，秦时为乌氏倮与寡妇清，以畜牧和开矿致富，汉初企业家更多，冶铸有卓，郑，孔，经商有刁闲，师氏，粮食有任氏，畜牧有桥姚，金融业有无盐氏，关中富商有田氏，栗氏，杜氏。但只出现在武帝之前。

3、《中国经济史》的笔记-原始社会&东周

原始社会对于中国来说当然是部族型社会，例如神农氏，轩辕，女娲。虽然都是神话的内容，但是根据典籍这些都只不过是部族的形态罢了。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人们在各个领域都有长足发展，其中经济像我们所描述的是易货贸易或者是使用贝壳之类的东西当做钱粮。新石器时代随着青铜器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值得让人惊奇的是，税课这种东西居然在远古时代就出现了。

其中在夏商周，西周时代，人们已经利用课税来调节经济，虽然我不知道这种观点是出自于何处，但是这种征税方式着实是一个惊奇的发明。另外，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已经有区位优势理论的出现就是说，征税和进贡是按照到城市中心距离来计算的。这是让人觉得很惊讶的，就是拿五百里作为一个征税的标准，平行运输成本等等！

另外西周时封建时代的一个标志，虽然当时的情况比较像西欧中世纪的冷兵器时代，在西周之前，分封制属于比较松散的形态，但是到了西周就有了比较统一的征税，进贡的系统了。这个时候最出名的制度莫过于井田制了，国家仿佛是一个偌大的指挥中心，管理就业，人口，分地，祭祀，各种资源的等级分配。这个时候的特点莫过于金字塔制度了，就是每个人都只能各司其职，资源并没有很好的流动，而是由国家统一分派管理等等

当然，时势造英雄，这些都是时代的产物。当时是由于部族刚刚安定下来的一种比较原始的形态，所以也没办法挑剔了。那时候的人们到时比较渴望安定，不是战乱，流离失所的生活吧。所以生活还是相当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基本上国家分到的都是零成本的农田。另外周朝时候的课税制度鼓励大家去耕种公用农地的方法我想到现在还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吧！

4、《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277页

看到现在为止，稍微有些失望。

文章中的史料充足，大量引用着文献中的原文。这样的引用让我少了很多阅读乐趣。毕竟阅读文言文的流畅程度要差很多。就像开车不断过减速带的感觉一定很糟糕。而且许多完全没有进行处理的引用多少让人觉得偷空减料。证明了作者的阅读量很大，但却没有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

研究历史需要不断证实和证伪。这一点作者并没有做到。很多时候作者下的结论都很捉风捕影。比较让人惊诧的一个就是关于汉代文景之治时期社会经济达到一个20%利润率完美平衡状态的论调。这样一个完美状态在其他时期都没有实现过，根据某史书上的一小句话，作者相信在此时由于政府的宽松管理达到了。未免有些不能让人信服。

书中的闪光点也是不少的，比如说汉朝之前非集权状态下富商涌现的史实，比如说其他正史很少研究的多元体制下地政治经济。不过数小时的阅读偶尔能够出现的一小个惊喜，并没有能让人有阅读的成就感。

但大概搜索了一下，豆瓣上的中国经济史，这一本应该是拥有最多读者的吧。可以想象，这已经是最成功的一本经济史了。

看来还需要一个更有掌控力的大师，用更简单明了但更沉着有力的剑法，勾勒出条理清晰的经济史了。

这样的大师暂时没有出现的原因，难道是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有许多赚外快的机会，没有时间沉心写书了么。

5、《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130页

刚读完战国时，战国时从经济角度和文化角度而言均有相当可取之处，如果各国之间出现相对均衡的寡头竞争时，从文化、创新以及经济发展都是相对有益的。

从梁惠王与孟子的对话可知，战国初期人民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这样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迫使侯国间为了称霸而争施仁政，并且大力招揽人才。这是春秋末到战国初轰轰烈烈百家争鸣的政治制度条件。但是我比较关心的是从经济角度各国如果是充分竞争，按理应该争相减税以利百姓迁入才对，要么就是寡头竞争情况下，各国联合一起形成了价格联盟？《管子幼官》中看到齐桓公“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可见当时的价格联盟。

还有一个问题是，周的田产不是私有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田产属于邦国，授田于民并且进行纳赋。

春秋时，各侯国均将田产分给其后代和亲戚，于是形成贵族分封制，就是所谓的封建制。但中国实际上从来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封建制，封建制分封裂土，中国没有长子世袭，因此，不久财富就慢慢变化了，有的实行了兼并，有的则因慢慢分家而将财产一点点稀释掉。（商鞅曾经在变法中强令要求分家，一方面防止财产过于集中，另一方面也是尽可能增加人丁以利于战争和生产需要。）但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却为自由迁徙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即使是封建，也和西方的封建完全不一样，西方的封建制更多的是城邦主，附属农田，手工业和商业。但我们的封建在侯国的角度有点类似，到了微细胞处--即城市发展的角度，却很不相同。更何况，我国早自楚国就开始试行郡县制了。

春秋战国时期，铁器，耕牛开始使用，尤其是水利的兴建，使生产效率提高很快。商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西周开始的重农轻商思想，最终由商鞅变成一种基本国策之后，对商业和手工业，以至于中国创新的打击是致命的。（本文认为重农也是军事上的一种必要。为什么这个误解深化了这么多年

，我想了几条原因，1，军事需要--农民利于征兵，也利于军农统一。2，工商流动性大，不利于国家管理。3，后世的儒家强化了这一思想，认为这样老百姓的思想会纯朴，利于管理。4，商业利润的征税不够高？但还是觉得不够。需要留待今后继续挖掘。）

6、《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132页

还是接着上文写，看到汉代，汉朝开始也是分封制，这种分封制一旦有了征税权，权力就非常大，因此象吴王吴濞权力很大，吴王吴濞因为吴地有盐有铜，因此对属地的百姓不征税，而且徭役也可以用钱来替代。因此老百姓纷纷归属，汉景帝也认为吴濞这是在争民心，但被逼之际，汉景帝也实行了一系列宽民爱人之国策，比如实行了历史上最低的赋税，而且免除了不文明的肉刑和笞法等等。看到这段想起两个问题，秦汉之初要重农轻商的主要原因是农业以土为本，有了土地人就跑不了，这样，就算是政治上有竞争，人民也有很高的迁移成本，确实有利于统治。

第二个问题，这种政治上的竞争对于统治阶层确实比较麻烦，但是对于经济发展来讲确实是利远大于弊。尤其是征税权的竞争，这对于经济发展，或者说降低制度成本非常重要。后来汉武帝在真正实行了大一统之后，政权垄断，人民就再也享受不了政治竞争带来的的好处了。

想想对于一个大的国家来讲，美国州政府的州征税权的设置对于美国的经济的发展很重要。后来中国经济屡次失于中央集权而地方没有活力，症结很明显。

7、《中国经济史》的笔记-第586页

关于晚唐南宋一段还是蛮有意思的。毕竟是中国经济最辉煌的时期。

作者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原则衡量南宋经济也有点看头。

前面的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的一致在这里被重提。蒙古人的马和欧洲人的船就是一致性的很好体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